

论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

刘少华

自从17世纪前期俄中关系形成以后，俄国早期对华政策在彼得一世时期(1682—1725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此前，俄国政府实行对华侵略政策。到彼得一世时期，这种侵略外交转变成了以和平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这时，虽然俄国仍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但从全局看，和平交往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这种和平关系以1689年俄中签订《尼布楚条约》为标志，到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侵略扩张是俄国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为什么俄国对华政策在彼得一世时期会发生这种变化呢？本文试图对俄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分析，以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俄国的根本利益使它把与西部邻国的斗争放在其外交决策中的首要地位

17世纪后期，俄国同东、西方邻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并发生了战争或冲突。在东方，俄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在西方，它与邻国瑞典、波兰、土耳其等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发生了战争。这样，俄国面临在东、西方同时作战的形势。如何应付这种局面成为俄国当时外交决策急待解决的问题。结果，彼得一世选择了与中国和平，同西部邻国进行争夺的外交政策。为什么俄国对东、西部邻国采取这样截然不同的政策呢？

首先，俄国有限的实力限制了它在东、西方同时作战取得胜利。17世纪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军事力量非常薄弱。当时的俄国还没有正规军，其军事力量由贵族民军、射击军和新建骑、步兵团组成。贵族民军和射击军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弱，到17世纪后期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由于军事、经济实力不足，迫使俄国只能集中力量在一个方向进行战争。

其次，既然俄国只能选择在一个方向进行战争，那么，它为什么要选择与西部邻国进行争夺呢？这是由俄国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决定的。17世纪俄国虽然地跨欧亚两洲，但是欧俄与亚俄相比较，欧俄是俄国的重心，欧俄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俄国的存亡。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欧俄的生存和发展是俄国的根本利益，其具体内容是同西部邻国进行斗争，一方面以保证欧俄的安全，另一方面夺取被它们控制的土地和出海口。这种根本利益决定了西部邻国与东方中国在俄国外交决策中所处的地位，即与前者的斗争是主要的；对后者的侵略是次要的。

保证欧俄的安全，进而维护整个俄国的生存是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俄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论述。他说：“莫斯科发展的历史环境，决定它不得不……同西方邻国进行斗争以保卫自身的生存。”^①俄国自16世纪统一国家形成以后，一方面它迅速地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西部强邻的侵略对象。17世纪波兰、瑞典先后发动对俄国的战争，土耳其及其藩属克里米亚汗国也不断对俄国进行侵扰。这些战

争和侵扰给俄国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威胁。俄国只有在保证欧俄安全的基础上才能发动对它的战争以谋取更大的利益。

夺取西部邻国控制下的土地和出海口，是俄国外交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既体现了俄国外交政策的侵略本质，也有利于俄国社会的发展。17世纪的俄国实际上是一个落后的内陆国家。这种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俄国与西欧先进国家之间的联系，不利于俄国的发展。当时，西欧先进国家早已废除了农奴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反，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却在不断完善和加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俄国的发展。直到17世纪末，俄国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其统治者也认识到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的重要性。要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加强与它们的联系和交往，那么，打通和控制出海口对俄国就显得特别重要。而17世纪的俄国，无论在黑海，还是波罗的海，它都无立足之处，所以，“俄国需要的是水域”^②。它要么南下取得黑海出海口，要么北上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以取得俄国“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③。同时，俄国把被波兰控制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看作是自己的失地，而且占有这些地区对俄国打通出海口有重要的作用，因而，俄国坚决要求重新吞并这些地区。这样，对出海口的需求和领土的吞并决定了俄国在17世纪面临三项急需解决的外交任务：第一，重新吞并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第二，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第三，打通黑海出海口。^④这3项任务使俄国政府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同西部邻国的斗争方面，而把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处于服从的地位。

特别是1687年和1689年俄国两次远征克里米亚汗国失败，而恰在这时，它与中国的关系紧张起来，如果俄国在争夺出海口的同时，又要侵略中国，那样它必然陷入两线作战。而现实的事实是：俄国对邻近的弱国克里米亚汗国都不能够战胜，那么，它有把握打败远在东方的大国中国吗？战争的失败迫使俄国作出慎重的选择：对中国实行和平政策，以集中力量夺取西部出海口。这样，“由于克里米亚远征完全失败的影响，莫斯科方面日益坚决而明确地力图尽速向中国缔结和约”^⑤。

此外，18世纪初俄国与瑞典和土耳其两方作战的结果证明：俄国不但不能取得两线作战的胜利；相反，这种战争严重损害了俄国的利益，对俄国是极其危险的。1700年，俄国发动对瑞典的北方战争。为了战胜对手，俄国已倾注了全部国力，1710年，土耳其又对俄宣战。1711年彼得一世进军普鲁河流域，试图一举击败土军，结果，俄军自身惨遭失败，连彼得一世本人也差点被俘。为了同土军停战议和，沙皇愿意归还所占领的土耳其、瑞典的全部土地，甚至准备割让俄国固有的领土，他对俄方代表下达谕旨：“如果他们真心言和，那么，除了不当俘虏，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吧。”^⑥这次失败，也使俄国考虑对华关系：既然俄国在与西部邻国的斗争中已经取得的利益都不能巩固，又怎能同时冒险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以夺取其土地呢？

以上分析证明，欧俄的生存和发展是俄国的根本利益，同西部邻国进行斗争以保证欧俄的安全和夺取被它们控制的土地与出海口是俄国外交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和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这就决定了西部邻国与东方中国在俄国外交决策中的主从地位。为了集中力量完成这些任务，俄国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由于实力有限，不能坚持东、西方两线作战取得胜利，因而被迫对中国实行和平政策。

二、追求经济利益是俄国早期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

获利是俄国对华政策的目的。“俄国从最初与中国发生关系时起，就让人家看出它想从它的邻邦的接近中捞些什么”^⑦。俄国想从中国取得什么呢？起初，俄国实行侵华政策，侵

占中国领土，同时又希望开辟对华贸易以取得经济利益。事实证明，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军事侵略被打败，贸易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怎么办？俄国政府认为，它“在远东只有两种可能：‘打仗或贸易’”^⑧。既然俄国忙于同西部邻国的斗争和争夺而不能同时与中国作战，那么就只好进行通商贸易。

17世纪，俄国征服了盛产毛皮的西伯利亚。“据统计，掠自西伯利亚等地的毛皮财富约占当时整个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由于缺乏贵金属，在17世纪的国家财政中，貂皮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现代的黄金储备的作用’”^⑨。俄国的毛皮贸易主要依赖欧洲市场。但到17世纪中后期，由于英荷战争的影响，以及北美毛皮开始充斥欧洲市场，俄国在欧洲的毛皮贸易衰退。而这时俄国的毛皮仍在不断积累。因而俄国把目光移向中国。一方面，中国邻近毛皮产地西伯利亚，运输方便；另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被认为是金银产地。这样，发展对华贸易，取得经济利益便成为俄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目的。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国内富商巨贾，强烈要求政府开辟国际市场。同时，俄国连年对外战争，军费增加，国库空虚。下表是俄国当时国库收入与军费支出情况：

年 份	收 入(卢布)	军 费 (卢布)
1680	1,500,000	0,750,000 (总和)
1701	2,500,000	1,839,600 (总和)
1710	3,133,879	2,566,324 (陆军)；433,966 (海军)
1724	8,546,000	4,003,348 (陆军)；1,400,000 (海军)

从上表可以看出，军费开支占收入一半以上。^⑩这种情况使俄国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对华贸易，聚集钱财，以资战争。1711年，彼得一世颁布诏令：“尽力聚集金钱，因为金钱是战争的命脉”^⑪。

俄国尤其重视对中国的贸易。为了开辟和发展对华贸易，从17世纪中期起，俄国政府每次派使前往中国，都要求中国清朝政府准许俄国商人往来贸易。清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满足了俄方的要求。

然而，对华贸易被俄国自身搞得困难了，俄国既要求通商贸易，又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清政府要求俄方停止侵略活动，并建议双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俄国政府对清政府的要求置若罔闻。为此，清政府拒绝俄商来华贸易，通商关系中断。侵略政策使俄国无法达到经商以取得经济利益的目的，因而，俄国改变对华政策，于1689年同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除确定两国永修和好之外，还确定了两国的通商贸易关系。此后，俄国商队不断来华，对华贸易迅速增长，给俄国国家和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它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并与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勾结，企图分裂中国领土。针对俄国的行为，172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中俄贸易，命令在华所有俄人立即离开中国。俄中贸易又一次出现中断。直到这时，俄国才认真考虑中国的建议。1725年，俄国政府派萨瓦·乌拉诺的斯拉维奇为全权代表来华谈判，双方于1727年、1728年分别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条约除划定了俄中中段边界，巩固和平之外，还恢复了双方的贸易关系。

由此可见，俄国政府对于中俄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为贸易这一目的服务的。当清政府就边界问题多次要求与俄国谈判加以解决时，俄国政府都置之不理，但当清政府宣布停止俄国对华贸易时，俄国政府就立即紧张起来，赶忙派使前来修好。所以说，对华贸易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俄国对华和平的重要原因。对此，加恩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好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商业”^⑫。“商业关系是俄国与中国交往的基础和理由”^⑬。

三、西伯利亚不具备作为对华战争基地的条件

如果俄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那么邻近中国的西伯利亚必然成为它对华作战的基地。但客观的事实是：西伯利亚在各方面都不具备这种条件！

首先，西伯利亚自然条件差，到处是丛林、沙漠，交通困难，运输不便。

其次，这里人烟稀少，被征服民族不断起义，俄国在这里的统治还不稳固。

再次，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力量薄弱、军事装备差、物资供应不足。

彼得一世改革以前，俄国还没有正规军，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力量是哥萨克或其他军役人员。他们只是一些杂牌队伍，战斗力弱。为征服中国黑龙江地区，俄国多次派哥萨克远征队入侵这里，但都被中国打败。1652年，入侵中国的哈巴罗夫向沙皇政府报告说：“为抵御博格德人（指中国清朝军民——引者），需要有6000俄国人并备有大炮和火药武器。那时，才能使达斡尔人（指黑龙江流域中国居民——引者）屈服”^⑭。他的报告使俄国政府深感困难。它试图征服中国，而俄国在西伯利亚又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军队。如果没有相应的军队，那么对中国的战争就难以进行。

1683年，莫斯科政府对西伯利亚军事力量、武器弹药进行统计，结果是：“整个达呼尔地区计有：21门炮，485只火绳枪，182普特（1普特=13.68公斤）火药，143普特铅弹，军职人员约2000人”。“俄罗斯在西伯利亚所拥有的军力共约4000到5000人”^⑮。俄国政府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讨论了对华战争的可行性，结果是否定的。为此，沙皇给叶尼塞斯克及达斡尔所有各地将军发出谕令：“对所有地区的外国人都不要有任何争吵和挑衅的举动”^⑯。

此后数年，俄国在西伯利亚军事力量增长较快。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俄国“在整个西伯利亚，驻防军和守卫边界线的服役人员共有9353人”^⑰。这样数量的军队分布在广阔的西伯利亚，仍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1689年以后，俄军在西伯利亚没有增长而处于停滞状况。

西伯利亚物资供应极为缺乏，这里军队所需的一切都要从欧俄运来，在当时的运输手段及当地的自然条件下，运输极为困难。此外，俄国在西伯利亚，特别是俄中边境地区的城堡设施很差。“国境线所有的要塞——尼布楚、伊尔库次克、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的处境极形孤单，全部用木料筑成，而且都已朽腐不堪”。边境重镇“色楞格斯克……，如果敌人来攻打，在两个小时内就可以烧光”。“尼布楚，……向那里投射火箭，半小时内就会化为灰烬”^⑱。

西伯利亚的客观条件表明，它不能作为俄国对华战争基地，特别是兵力不足，根本不能承担战争的任务。如果俄国要发动侵华战争，那么，它必须从西部边境撤军东调。这样，俄国西境敌国必然乘虚而入，威胁俄国的核心——欧俄地区。俄国为保证欧俄的安全，必须加强西部边境的防御力量，至于对中国，由于实力不足，鞭长莫及，因而被迫采取和平政策。

四、清政府对俄政策有利于中俄和平关系的出现和巩固

清政府一贯奉行对俄和平、友好的政策。俄国历史学家达维多夫对此作了客观的论述。他说，中俄双方的“态度完全相反”，俄国所持的态度是“掠夺加杀戮”；而中国则“真心地爱好和平”^①。针对俄国的侵略活动，清政府多次致书俄国政府，要求俄军撤出中国领土，谈判解决争端，俄方反应冷淡。俄国在雅克萨战争失败后才派戈洛文前往谈判，并派使先行来华乞求清军撤围。为了表达自己的和平诚意，清政府单方面撤军。为了争取和平，清政府在谈判中就领土问题作出重大让步。1688年，当中国代表索额图启程去谈判时，康熙皇帝谕令不能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次年，当索额图再去谈判并向康熙奏明仍照原议行事时，康熙态度转变，他说：“今日尼布潮（即尼布楚——引者）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臣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②结果，《尼布楚条约》把尼布楚等地让给俄国，满足了俄方的要求。《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严格遵守条约，对俄国的贸易实行优待政策，对其侵略活动坚持忍让。到18世纪20年代初，因俄国的行为，清政府被迫采取停止俄中贸易的措施。虽然如此，清政府还是力争和平相处。对此，俄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所行措施“有意维持和平并恢复贸易关系”^③。这是俄国政府决定派萨瓦使团前往中国谈判缔约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证明，清政府的和平友好政策对俄国在选择对华政策的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两国和平关系的形成和巩固。

（本文得到北京师大历史系王新教授和湘潭师院唐希中教授的悉心指教，作者在此深表谢意。）

注 释：

- ①（俄）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7页。
- ②③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22页。
- ④（苏）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史源译，三联书店，1979年，第371页。
- ⑤（苏）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贝璋衡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48页。
- ⑥（苏）尼·伊·帕甫连科：《彼得大帝传》，斯庸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239页。
- ⑦（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江载华、郑永泰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2页。
- ⑧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王立人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2页。
-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4页。
- ⑩Duffy·Christopher. *Russia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origins and nature of Russia military power, 1700—1800.*（克里斯托夫：《俄国通往西方的军事之路》）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第36页。

（下转第64页）

- ⑧《列宁全集》第28卷，第48—49页。
- ⑨⑪⑬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华盛顿·欧文著，查尔斯·奈德编删：《华盛顿传》，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81、640、643—644、705、720、720、475—476、747、724、758页。
- ⑩⑳杰里德·斯帕克斯：《乔治·华盛顿一生》，波士顿1839年版，第355、540页。
- ⑫菲利普·方纳编：《华盛顿文选》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2页。
- ⑬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华盛顿》，纽约1896年版，第222—223页。
- ⑭同⑨，见查尔斯奈德所撰《引言》，第3—4页。
- ⑮《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
- ⑯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 ⑰理查德·L·泰姆斯：《工业革命文献，1750—1850年》，赫钦森·依达克辛纳尔，伦敦1971年版，第13页。
- ⑱威廉·撒耶：《乔治·华盛顿》，伦敦1922年版，第168页。

下接第54页

- ⑪Vernadsky·George·ed·A source book for Russia history from early time to 1917. V.1(沃尔纳茨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⑫⑬加斯东·加恩，前引书，第3、291页。
- ⑭(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徐滨、许淑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27页
- ⑮⑯雅科夫列娃，前引书，第124—125、125页。
- ⑰瓦西里耶夫，前引书，第二卷，第13页。
- ⑱加斯东·加恩，前引书，原始文件，第341页。
- ⑲(俄)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的殖民》，第13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160页。
- ⑳《清实录》圣祖朝，第140卷，第30页。
- ㉑加斯东·加恩，前引书，原始文件，第330页。